

中国文论身份与文学创新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要:“文学性”问题,在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当代中国在文学的对象、文化知识建构、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中国文化“身份”等方面出现了一些争论,显示了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文化和文论创新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在当代中国,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不定,因此,文论流派原创是文论创新最切实有效的方式。

关键词:文学性;中国文论身份;文论创新;中国形象;流派原创性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4-0393-07

“文学性”问题,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突出,因为在严格意义上说“文学性”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文献性。随着文学的逐渐精英化而使文献资料性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忽略,仅仅突出其精英色彩。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诗论,诗书画论一体而古今皆然,所以没有必要由于文学是艺术的一部分而将它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变成为独立于艺术的一个门类。真正的问题,倒是在文学性背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诗意失落及精神身份失落的问题。

一、文学性话语与中国文学身份确立

文学性讨论不是空洞的文论问题,而是社会变迁中的文学身份定位问题。我想以具体的实例来谈谈“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问题。我们知道,“地缘处境”“地缘政治”具有其重要性。试想,如果离开了“安史之乱”的痛彻肺腑,离开了晚年杜甫在成都几年的生命感受和诗意书写,杜甫诗歌还剩下什么。在文学专业范围内,文学和文学理论共分成了四个方面,而今天在这四个方面争论不休,显示出文学身份认同的危机。

(一) 文学的对象

文学对象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有而难以限制,无论是天地花鸟还是民生佛禅,都可以成为文学

的一部分,大众文化当然也是其一部分。作家写的文学文本成为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要写成一个杂揉的后现代文本,甚至新闻、图片、影像资料和插科打诨等也无不可,只是它们要进入精英的行列很难。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经济学的合谋,批评立场消失,身份模糊,言辞浮躁,价值飘逝。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转换思路,关注“中国文学的地缘处境”:今天人们是否清楚周边国家的利害冲突问题?是否清楚人类的生物链基本构成以及在生物链中我们处在哪个维度?是否清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涵义?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力上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维持上升。统计表明:2004年GDP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第一位美国116 675(单位:亿美元),第二位日本46 234,第三位德国27 144,第四位英国21 409,第五位法国20 026,第六位中国19 317,第七位意大利16 723,第八位西班牙9 914,第九位加拿大9 798,第十位印度6 919。

事实上,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飚升到了全球第四位^①。据一些经济学家的乐观估计,2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国。但是与此同时问题也出现了:中国在逐步提升军力的时候,美国已经制造出了子弹大的原子弹(原苏联还是手提原子

收稿日期:2006-07-06

作者简介:王岳川(1955-),男,四川安岳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到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2年,现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客座教授,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弹),而且美国全球霸权的军事活动加剧,在关岛的三艘航空母舰的“盾牌行动”针对性十分明显^[1,2]。在我们还在谈论某些文学内部问题时,其实外部环境正在酝酿着关键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在当下的文化讨论中应该引入“地缘”“处境”等问题,因为中国今天的周边地缘关系要关注李登辉宣称的“七国论”——强迫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战火纷飞、血腥伤亡的中东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已经被西方传媒谈论成了种族和宗教问题;被亨廷顿强调的21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难道一定不会出现?难道我们就可以完全掉以轻心?这难道不是文学要思考的对象?不是文学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和它的大关系网络吗?如果丧失了这些重大问题,而仅仅谈论那些风花雪月的所谓文学性问题究竟有多大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地缘文化问题非常多。正如《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一书所说的那样:“美国200余年的历史,走过的是一条争取独立、大陆西进、海外扩张、国势崛起、与苏对峙、称霸全球的轨迹。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西战争以后,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纵横,美国终于接替英国获得霸权国地位,成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然而,永久的强势地位绝不可能来自武力的胁迫和经济的牵制,先进的价值观和充满活力的文化再生体系,才是征服他国家的最终力量。”^[2]

台海局势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台独一日不止,战争可能性就依然存在。如何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很高的战争艺术^②。台海战争将使得文学地基、文化身份、社会空间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氛围当中,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中国文学的深度问题。如果不思考,还像1980年代的现代性西化、1990年代的后现代性西化那样,将在彻底西化以后出现“本土文学真空”,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扼杀了文学精神。

1998年韩国出台了一个文化国策:“文化立国”,成立了多个相关基金会,要大力推出“韩流”。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推向海外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战略。随着“韩流”的成功,要进一步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仅仅5千万人的韩国远远地走在中国前列,中国的思想家、理论家该做什么呢?

另外,关于中日“东海油田”问题。日本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心存疑虑和嫉恨,日本的军事武装明显想压制中国,日美联合的趋势值得充分注意。我注

意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以及我们的所谓书法家、音乐家或画家几乎都没有思考或触及这个问题。这已然说明国内的思想界诸多差异性,导致了中国大抵只能继续强调韬光养晦。这些,使得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文化交流产生和平祥和的气氛,是文化在当代多极世界的重要意义所在。文化不仅仅是教化,它也表征着国家安全和人类和平的意识。如中日间摩擦较多,除了其它多种原因以外,还因为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没有注意到文化尚未深入世界人民的内心。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科技和军事“硬实力”的同时,文化的“软实力”更需要加大力度发展。

(二) 文化知识建构应该走出封闭而重新阐释世界

当代知识性出现了很大困惑:经典知识正在失效,高雅文化已经丧失了“修为”的时代氛围。如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被人们称为“无聊至极”,于是胡戈就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使得陈凯歌变得更加无聊。过去的陈导代表着一种电影的权威和大制作的精英的身份,“馒头事件”引发后,人们对大导演的权威身份认同感消失了;博客上关于白烨和韩寒的争论,“所有的圈都是花圈,所有的坛都是祭坛”不胫而走,使文坛甚至是任何坛都变得可疑起来;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几个逆反式阐释的例子:自从有学者提出屈原究竟为什么而投江而死这一“天问”后,历代士人都在寻找着最合逻辑的答案,今天有人似乎终于找到了:屈原是因为爱楚王之妻妾而死的;有人说,陶渊明曾经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陶渊明晚年流浪多年讨饭,尽管他为五斗米没折腰,但日后为了一碗饭而尽折腰;对于李白之狂,有人却言之凿凿说他是媚俗之狂;而杜甫忧国忧民,也有人说他是一心想做官。戏说风还未过去,虚无风又来,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的读者以及我们一般人对文学还能产生一种脱帽的崇敬感?还会认为文学具有精神的魅力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得今天的知识建构能够具有专业精神而不让别人说三道四呢?今天的诗人不少进入了世俗化平民化,今天的电影进入了大众狂欢的平台,今天的博客使得批评家的尊严权威丧失殆尽,文化究竟在丧失文化生态之维中降解着怎样的精神价值呢?

(三) 文化误读和文学误读应该成为一个国际性关注的话题

整个世界都知道中国经济起飞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正在增大。在美国人的餐桌上、课堂上或在任

何地方,人们都有可能谈论中国。今天在美国不谈论中国,就像在中国不谈论美国一样是落伍。然而,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很多。有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值得一说:近期我被聘为首席专家,出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各国电台台长和汉语主播的研讨会。我想知道的是,这些金发碧眼用汉语播音的外国人怎么理解中国文化?了解到了何种程度?在研讨会上,我吃惊于文化误读无处不在。以下例子可以窥豹一斑。第一题:列出四位中国名人(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请按照自己的喜好站队。包括美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共18个主持人和台长中,竟然有16人站到了李小龙一边!文化身份出现了,他们是看李小龙的电影长大的,他们只知道李小龙而不知道孔子。一个美国人站到了苏东坡名下,她说因为永远喜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记住了苏东坡。孔子前面站了一个韩国人,为什么站在孔子面前呢,他说孔子成了韩国的精神之父!第二题:请选出中国四部经典(《老子》《论语》《红楼梦》和金庸小说)。主持人几乎全部站在金庸的门下。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西方在整体性地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第三题:请你在四大美女(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下边站队。结果16人站在了巩俐面前,2人站在西施一边。可见大众媒体影响之大,使得当代精英文化正在丧失文化辐射力。当然,重要的不是去批评媒体、网络、电视、广播,而是要在这个中性平台上去运行我们的思想,把真正文学和文学知识建构的东西贯穿进去。只有如此才会尽可能地减少文化身份错位和误读。

(四) 中国文化“身份”模糊

这十几年里,一大批学者确实是在做西学或者说西方文艺理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学的研究对象在逐渐转向。在转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在回归什么,而是强调自己的身份立场。我在课堂上用《大学》《中庸》两篇经典试了试博士班的学生。朱自清教授说,在中国古代,《大学》是人们在十五岁读完小学以后进入大学(那时没有 middle school)时的读物。我请两位文学博士生解释被朱熹称为“三大纲领”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结果回答得不行。在过去十五岁学生的读物,今天大学的博士生居然也难以解释清楚!然后我将《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书写出来请他们解释:为什么开篇这么强调“性”“道”“教”?结果仍然没人能解释清楚。这表明在知识结构的建构

上,当代教育严重西化已经使学生成为了严重的“文化偏西者”和“文化厌中者”。大学生乃至博士生的知识结构已经变得很不文化生态了;人们在谈论自然生态时,精神生态已经出现了相当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往深处说,是过去的“现代性”命题对儒家和道家思想过分批评或疑古所致。我又问为什么孔子要说“吾从周”?很多人从“吾从周”字面上认为孔子是克己复礼,要回到周代而不要当代。其实这是没有读孔子这句话的前后文。“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谈到夏太远,文献不足证;殷商尽管还有残留的遗民,但是已经衰微,所以只有当代,不管是西周还是东周,是可以认同随从的。孔子是春秋末期,所以“吾从周”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是说古代(夏商)的礼,再也不要坚守它了,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前的情况来定。谁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回到古代?谁说西方只是往前面发展而不往后返观?随着中国的崛起,只有三“和”可以让天下人心服。和,就是东西方的大融合。重新认识《大学》《中庸》,复兴儒学,不仅仅是恢复一些礼仪,更重要的是恢复其精神。一般的仪式都可以删改简化甚至废除,而真正的中国精神则应该发扬创新。《礼记·中庸》说“道不远人”,道就存在生活当中。但为什么一变成为“学”就离人们远了呢?一变成了高头讲章就与我们疏离了呢?因为它中断了道与生活的联系,中断了道与人心的联系。

上例说明,文学界文论界对古人思想了解太少,对西方知之甚少,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政治漠不关心从而被世界所疏离。真正的诗人应该关心一些大的动向,关注风云突变的时局。一些术语之争范畴之争和世俗之争太多,放弃了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和争论,长此下去将使中国与诺贝尔奖、与重大理论的提出、与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越来越远。丧失了问题意识和身份意识的文学及其理论,就会不知所云或离题万里。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属性,但文学(literature)这个词的本意不是纯文学,任何文学一旦绝对纯了,同样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我们也不能对抗纯文学,它是我们文学中的高峰尺度,代表从事文学业务者精神冲刺的高杆。如果一定要把这高杆扫平,使满地都是精神侏儒,那文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同样,如果只要这个高杆而其他形式都不具有合法性,生活还有何多元斑斓的色彩?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应该加强中国的文学身份性建构,看看我们还剩下什么还剩下多少!如果以东方的智慧

避免了核战争,未来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国,那时我们当以何种文化形象面对西方?用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让西人认识并欣赏东方文化魅力?西人来到中国听中国人在唱着卡拉OK,只好说那是日本的;看玩的是波普艺术或者流行艺术行为艺术,只能说那是美国的。那么,中国文艺理论界究竟还能拿出什么来作为西方人辨识我们身份的标志?如果没有这一根本标志,当代文化和文学又谈何体系创新?!

在传媒时代,文化兴盛除了一定要有制度性调整以外,还需要文化氛围和媒体平台的良性调整。在文化氛围中传媒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播到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当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文化精神的播撒重在传播和宣传,当代传媒不是西方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张本之地,而是应该营造出东西方互动的文化趋势^③。这需要传媒对文化保持公正心态,充分重视对东方文化价值的宣传,使文化播撒不是片面的,而是东西方平衡的,这样才能真正走向生态文化的新境界^[3-5]。

二、当代中国文论身份与流派原创性考量

当代中国在文论边界扩大化问题上争论不休。中国文论身份出现了辨识上的危机。文化严重滞后于经济崛起。文论家的集团没有形成,甚至可以说在长达20年时间之内,学者在一个一个地细读、消化、评论西方文论家,但是没有整体性地对中国当代20年以来的文论家加以研究的著作^[6]。中国当代文论的前沿话语是同整个世界前沿话语相连的,其重要语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构成的一种特殊的张力场。在这一张力场中,文论的创新与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

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

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尊重差异性文化。多元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国家文化形象。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人类体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7]。

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学理论将建构多元多样性诗学为己任,这种多元文化观将使汉语学界突破西方文论的单一知识框架,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学观念,关注中国文学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现代性诗学特征,并通过对差异性文化精神的体认,获得更为宽松多元的文化差异性结论。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消费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艺术肉身化挤压精神性成为时代的标识。

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中的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占主导地位,而精英文化却在日常理性中日渐衰颓。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艺术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高层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绿色生态化,使人在“红色写作”之后不坠入“白色写作”的怪圈,而是进入“绿色写作”的良性氛围,需要文学

知识分子认真地思考。因为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地位。

研究文艺学离不开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现代文论,这是塑造新世纪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在一个相互交织并消解冷战思维模式的共存时代,如果没有西方“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中国文化的“自我”。通过文化镜像深度地自我审视,将有助于把东西方文化的对抗转化为不同文化体制的创造性互动。我们只有在东西方有效对话的前提下,进行现代性反思和价值重建,才有可能使本土性真正与全球性获得整合,从而冷静清醒坚实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文论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论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要使中国文论经验世界化。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

当代中国文论流派的原创首先是体系创新。创新的体系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不妨说,“20世纪西方文论”从新批评开始,现象学、解释学,包括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无一不是哲学登先。20世纪的哲学和诗学具有精神互通性,其表征为:所有诗学的重大命题无一不是哲学家提出的,而哲学的反思也首先成为人性的诗意反思。20世纪哲人和诗人显示哲学和诗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将本体诗化或将诗本体化,从而使关于人生价值存在的哲学成为诗性哲学,使富

于诗人气质的哲人成为诗性哲人。诗与哲学同一,诗人与哲人一体。20世纪重大的诗学问题与哲学命题紧密相关,意味着哲学与诗学在20世纪哲学危机中的相遇并面对同一问题,同时还说明那种单一地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封闭研究的时代已经结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人类“现代性感性本体论”问题——审美个体主义问题和诗意栖居问题已然成为世纪性课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艺理论提供哲学的高台,所以当前的中国文论才显得如此混乱和迷茫。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其次是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但中国的文学经验却跟着西方走得太远。一些前卫作家经常把翻译的二手西方文学作品仔细琢磨,倾力模仿其语式、开场和结尾。作家已经远离个体体验的生命血性,正在背离中国经验的当下性和本土性。当文学的价值生成和精神地基失落时,中国文论家文学批评家不再读这类克隆西方的文学作品,而只读西方理论进而克隆西方文艺理论,这使得文论在批评和文论建设方面走向双重失落。当代文学似乎不屑于具有本土独特性——中华性。中国每年生产的长篇小说1000余部,当时写小说的人比读小说的人更多。人们已经不再读作品而转向读“身体”,开始和作家共同合谋发掘欲望化肉身化的“身体”。今天所有的困惑由身体开始。作为个体的生命是物质的非物质形式,是随着对生与死的思考并抵达存在之根而展开的。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地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诗人或哲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秉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本体论从神、从人的理性、从人的意志已然降解到弗洛伊德说的人的欲望。“下行本体论”表明人类“上行本体论”的终结,于是人类的精神痼疾正在成为死症。我感兴趣的是,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三是文化价值论的创新。可以说,人类在“语言

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的失落,因而应有一次“价值论转向”或“价值论复归”。20世纪美国 pop 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考量、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①。

这一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有这么几方面,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二是学科身份泛化。这一点在书法界同样存在,今天书法界出现了不写汉字的书法。墨子就有“书于竹帛”之说。当书家不再写汉字时,大抵不能称自己是书法家而应该叫抽象画家,大可不必跻身于书法专业圈子之内而应进入画家的行列当中。同理,那些不再研究文学的应该叫做泛文化家,而不应称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三是文学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创作和读者兴趣的位移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很难把握。文学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集中的话语平台,而当下却是一个散漫无根的“超话语”平台,这是因为读者的兴趣和创作者的兴趣发生了错位,读者的兴趣经常左右着理论家的兴趣。超级女声的出现引起了媒体界的大辩论,现在超级男声很快要出台了,这种大众化的兴趣不断引导文学理论批评家,理论家再也不可能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而仅仅成为大众兴趣的跟随者。文论的颓败由此开始。

新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工作是,切实地回到文论流派原创性上来。既然文论体系创新尚无哲学根基,文论范畴创新尚无文学的丰厚土壤,文化创新又变成学科的身份无定,那么回到流派创新是最切实有效的方式。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西方文论的流派,人们很少谈及体系创新,因为后现代以降“体系”这个词已经变得很可疑了,是否合法还值得讨论。古文论专家提出的先秦无“风骨”范畴,魏晋无“妙悟”范畴,唐宋无“神韵”范畴。中国历史是推进性的,比如中国书法是汉代尚“气”,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明代尚“韵”,清代尚“朴”,当代尚什么呢?尚“俗”。每个时代都以各自的方式往前推进。一个朝代几百年,产生过多少流派,但用一个字对其精神气质加以概括,达到本质界定。

在我看来,强调流派性可以有传统派、感悟派、评点派、境界派;也可以有比较标准的现代派、体验派、精神生态派、价值学派、文学消费学派,甚至文学媒介学派、文学身份学派、文学公共领域学派以及本体学派等。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

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注释:

①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底发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3万亿人民币(约合2.26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位居世界第四。

② 参见《中国台海军事》,中国军事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法)弗朗索瓦·于连《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认为:“福柯在日本一个禅宗寺庙里被问及有关哲学未来和东方思想能给他带来什么”时,他随意地重申:我们的时代不可能产生任何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相反,他劝说人们要从人类学或精神分析学以及欧洲和非欧洲之间的“碰撞”,去对哲学进行“再审视”。我也许可以断定,不必期待“东方”带给西方所“缺少”的,譬如东方掌握的某种神秘主义的启示——这种神秘主义也许是我们的理性主义的反面,能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最坏的是有“宗教术士”的幻觉的东方);而是要小心地去工作,让东方给思想以自省的机会。

④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

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漩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参考文献:

- [1] 张世鹏.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 谢韬. 帝国残梦——美利坚霸权主义的终结[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 [3] 何怀宏. 生态伦理[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2.
- [4] 庞廷. 绿色世界史: 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5]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关世杰. 世界文化的东亚视角[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7] 成伯清. 走出现代性[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On the statu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in China

WANG Yue-ch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matter of literariness being discussed in our time centers on the problem of orientation of literature identification in social changes. Some disputes in object of literature, cul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on, culture misread, literature misread and culture identification, etc in contemporary China show the crisis of literature identification recognition.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tegrates closely with China's position, while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s conducive to "China image" in 21st Centu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system has no founda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category has no "fertile soil" of literature, while the innovation of culture can't be subject. Thus, the originality of literary criticism schools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Key words: literariness; the statu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the innov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image; the originality of schools

[编辑: 苏慧]